

彩图版

国学经典规范读本

论语

〔冯国超◎译注〕



SINCE 1897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

彩图版

国学经典规范读本

论语

【冯国超◎译注】



商务印书馆

二〇一八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论语:彩图版/冯国超译注.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8
ISBN 978-7-100-15719-3

I.①论… II.①冯… III.①儒家 IV.①B222.2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03024 号

权利保留,侵权必究。

国学经典规范读本

论 语

(彩图版)

冯国超 译注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78-7-100-15719-3

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开本 787×1092 1/16

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35 1/4

定价:149.00 元

前言

在中国古代经典中,《论语》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。以《论语》为代表的儒家思想,不仅是自汉武帝以来的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,而且已经渗入古代中国人的血脉,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根本准则和精神世界的终极依托。即使在当代社会,《论语》中提倡的“孝”的思想,要做君子、不要做小人的思想,要重视自身道德修养的思想,等等,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甚至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言行。

“论语”的“论”读作 lún,通常认为指论纂即编纂的意思;“语”指语言。因此,所谓“论语”,即把语言编纂起来的意思。当然,这里所说的“语言”,并非泛泛而指,按照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的说法,它是专指“孔子应答弟子、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”,即指孔子及其弟子的语言。不过,确切地说,

《论语》除了记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,也记述孔子及其弟子的行事,因此,《论语》是记述孔子及其若干弟子言语行事的一部书。

《论语》共二十篇,篇名取自每篇第一章开头的几个字,如《学而篇第一》第一章的开头为“子曰:‘学而时习之’”,便取第三、第四两个字为篇名;如《卫灵公篇第十五》第一章的开头为“卫灵公问陈于孔子”,便取其开头的三个字为篇名。其余依此类推。因此,《论语》的篇名与其内容主旨并无内在的联系。篇下分章,《论语》共有505章(各种版本的《论语》分章多不相同,有分为500章的,503章的,512章的,等等。主要是对“乡党篇第十”的分章不同,其余各篇的分章大多相同),每章内容相对独立,上章与下章之间多无内在的逻辑关联。因此,《论语》更像是一部名言警句集和

孔子及其弟子的生活片段录，而并非一部系统的学术论著。

然而，神奇的是，《论语》一书的结构虽然看上去十分松散、随意，缺乏严密的逻辑和完整的体系，但是，读完《论语》，一个温文尔雅、坚韧不拔、充满智慧而又不失风趣的孔子形象却能跃然纸上，仿佛在对你谆谆告诫，言传身教，给你的灵魂带来深深的震撼，给你的思想带来脱胎换骨般的改变，从而让人对孔子充满感激。因为，正是孔子，如一盏明灯，照亮了历史的漫漫长夜，温暖着人们孤寂的心灵，让人们在天地间安身立命，在逆境中自强不息，在平凡的生活中感受乐趣。此正如程颐所说：“读《论语》，未读时是此等人，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，便是不曾读。”（见朱熹：《论语集注·论语序说》）意即不管是谁，只要你真正认真地读完《论语》，把握了《论语》的思想精髓，你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必会发生重大的变化。那么，《论语》为何具有如此神奇的影响力和魅力呢？这便与《论语》中蕴含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有关。

《论语》原文只有一万多字，然而

却包含道德、政治、法律、经济、文学、艺术、处世、交友、教学等各个方面的内容，而且对其中的每一个方面，孔子都有其独特而又深刻的论述。在我看来，在《论语》一书中，最具特色、同时也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。

首先当然是仁。因为众所周知，仁是孔子儒家的核心概念，在《论语》一书中，直接与仁相关的论述就达四十多处。概括《论语》中关于仁的众多论述，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几个特点：

1. 仁的核心和实质是爱人。在《论语》中，虽然孔子的众多弟子如颜渊、子贡、子张等不断地问他什么是仁，但孔子的回答多集中在怎样才能做到仁，真正关于什么是仁的回答只有一处，这便是《颜渊篇》中所记载的：“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‘爱人。’”（12.22）意即仁就是爱人。所谓爱人，即以深厚真挚的情感对待别人。试想一下，如果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能以深厚真挚的情感对待他人，则人与人之间的对抗、冲突便将不复存在，人类社会必将成为和谐幸福的乐园。因此，孔子儒家把仁即爱人作为

自己理论的核心和基础,既决定了其积极入世的品格,又奠定了其在人类文化中独特而重要的地位。

2.“爱人”一词虽然看上去极其通俗平易,但是要把它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去操作却并不容易,因此,孔子为仁的落实提出了两条充满睿智而又切实可行的途径:一是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(12.2),一是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(6.30)。所谓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即自己所不想要的,就不要施加给别人。所谓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,即自己想立得住,就让别人也立得住;自己想通达,就让别人也通达。第一条途径是从自我控制和约束的角度而言的,第二条途径是从积极帮助他人的角度而言的,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即都是设身处地,将心比心,而且操作起来又极其容易:一件关系到他人利益的事,自己该不该去做,你只要扪(mén)心自问即可,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你身上,你会感到高兴,那么你就去做,否则就不应该去做。

3.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,它们操作起

来虽然十分容易,然而现实中能这么做的人却并不多,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,便是这种操作必须以仁爱之心为基础,一个对他人缺乏爱心、自私自利的人,是很难去为他人着想的,当然也就不可能做到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想要他去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,就更是难上加难了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,孔子便把仁爱之心的培养作为重要的任务,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法。如《颜渊篇》中记载:“颜渊问仁。子曰:‘克己复礼为仁。一日克己复礼,天下归仁焉。……’颜渊曰:‘请问其目’。子曰:‘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。’”(12.1)这是把克制自己的欲望,回归礼的要求作为培养仁爱之心的方法。而之所以要克制自己的欲望,是因为过多的欲望会使人变得自私自利,影响对他人的爱心。如《阳货篇》中说:“子张问仁于孔子。孔子曰:‘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。’‘请问之。’曰:‘恭,宽,信,敏,惠。恭则不侮,宽则得众,信则人任焉,敏则有功,惠则足以使人。’”(17.6)这是通过恭敬、宽厚、诚实、勤勉、施予恩惠这五种德行来培养

仁爱之心。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，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
4. 由上可见，仁爱之心的培养并不困难，因为它只要克制自己的欲望，一切按照礼的要求去行动就行了。所以孔子说：“仁远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（7.30）又说：“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”（12.1）意即一个人只要立志拥有仁德，便迟早会拥有仁德，因为仁德取决于你自己的内心，而不可能由别人来强加给你。然而，所谓拥有仁德并不困难，这只是从理论上说的，在具体的实践中，一个人要拥有仁德却是十分困难的，这从现实生活中仁德之人极为罕见便可得到证明。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评价了大量的人物，然而，在孔子看来，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，真正拥有仁德的只有管仲、伯夷、叔齐等寥寥几个，颜回只是接近拥有仁德，像令尹子文、子贡、子张、子路、冉雍等人则都不具备仁德。而之所以会如此，是因为一个人是否拥有仁德，不能以一时一事为依据，一个人只有以追求仁爱之心为目标，并且一辈子矢志不渝，经过长期的修养，才能称得上拥有仁德。所以孔子说：“回也，其心

三月不违仁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。”（6.7）即在他的弟子中，只有颜回能做到长时间具备仁德，其他弟子则只是某月某日偶尔拥有仁德而已。所以曾子才会用“任重而道远”“死而后已”来形容拥有仁德之艰难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（8.7）

5. 虽然仁是孔子儒家的核心概念，培养仁德之人是孔子实施教育的重中之重，但是，仁德之人并非孔子儒家追求的最高理想目标。大体而言，根据道德修养的高低，孔子把社会上的人分为四类：圣人，仁人，君子，小人。其中小人是自私自利之人，他们拒斥个体仁爱之心的培养；君子是有一定的道德修养水平并以追求仁爱之心为目标的人；仁人是具备仁爱之心并能始终坚持不懈的人；圣人则不但具备仁爱之心，而且能把此仁爱之心外化为具体的行动，去为全体民众的福祉（zhǐ）而无私奉献。所以孔子说：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”（14.6）即作为君子而没有仁德的人是有的，没有作为小人而有仁德的。这就明确指出君子的修

养水平比仁德之人要低。在《雍也篇》中,有这样的记载:“子贡曰:‘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,何如?可谓仁乎?’子曰:‘何事于仁,必也圣乎?尧舜其犹病诸!夫仁者,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。……’”(6.30)这就说明,仁侧重于心理上的修养和境界,而圣则不同,它不光要具有仁心,而且还要能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。由此也可以解开学者们在理解《论语》时一直存在的一个困惑:孔子主张“天下有道则见(xiàn),无道则隐”(8.13),那么,生当春秋乱世,他为什么不去隐居,而要为推行自己的治国理想而奔忙于列国之间呢?原来,孔子是把圣人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,圣人以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为己任,怎么可能去选择隐居呢?

6. 仁德的培养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。据上所述,培养仁德是极不容易的,它需要一个人一辈子持之以恒的坚守,所以曾子才会说“死而后已”。那么,这是不是意味着必须等一个人死了,我们才能评判他是否具有仁德呢?不是的。在儒家看来,一个人只要以仁德为追求的目标,矢志不渝,久而久之,

就会由量变到质变,达到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;而人一旦进入了这种道德境界,便会“一得永得”,无论在何种境遇下,视听言动都不会违背仁德。孔子称赞“回也其庶(shù)乎”(11.19),称自己“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(2.4),包括后来孟子所谓集义而生的浩然之气,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本体呈现,都证明了这种道德境界的真实存在,只不过普通人很难企及罢了。

以上对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及其内在逻辑进行了概括的介绍,所用篇幅较长,这是因为,如何系统地理解孔子关于仁的思想,一直是《论语》解读中的难点;然而,如果不能对孔子关于仁的思想有深入系统的把握,则无法真正理解《论语》思想的精髓。

其次,君子人格及君子与小人之辨。在当今社会,一个人若被斥为小人,则必然是因为其自私自利、缺乏诚信、人品低劣;虽然人们大多不会在别人面前自称君子,但在其内心,则多是把自己定位成君子的,或至少希望自己是一个君子的,几乎没有人会愿意做一个小人。这种观念,无疑主要是受到了《论

语》的影响。在《论语》中，君子、小人这两个概念出现的频率极高，甚至超过了“仁”，是孔子着重论述和辨析的概念。关于《论语》中对君子的论述，值得我们注意的主要有以下几点：

1. 在道义与利益的关系上，君子以道义为追求的目标。这里所谓的道义，主要指仁道和正义。如孔子说：“君子去仁，恶(wū)乎成名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”(4.5)，“君子喻于义”(4.16)，“君子谋道不谋食。……君子忧道不忧贫”(15.32)，“君子义以为上”(17.23)，等等，都说明君子不以利益为追求目标，君子追求的是仁义道德。这是君子最大的、也是最重要的特点。当然，君子也不是完全排斥利益，如孔子说：“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”(8.13)，即当国家政治清明时，如果一个人既贫穷又卑贱，便是可耻的事。因此，关键是君子要用正当的手段去获取利益，而当利益与道义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就必须舍利取义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”(4.5)

2. 在言与行的关系上，君子重行而

慎言。重视实践和行动，反对说话轻率、花言巧语，是孔子一贯的主张。如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”(2.13)，“君子欲讷(nè)于言而敏于行”(4.24)，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”(14.27)，等等。孔子之所以反复强调行动比言说重要，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孔子儒家重视道德修养，而道德修养必须依靠脚踏实地的行动，你构造的理论再精致，其中的逻辑体系再严密，都不能代表你的道德修养水平有多高。

3. 在名声与能力的关系上，君子重视能力而轻视名声。通常说来，一个有能力的人自然会有名声，一个有名声的人也肯定会有较强的能力，然而，现实中却常常有名不符实的情况，也存在能力很强的人却默默无闻的现象。因此，在孔子看来，君子与其去追求外在的名声，不如去重视自身能力的提高：“君子病无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”(15.19)，“人不知而不愠(yùn)，不亦君子乎？”(1.1)但是，孔子反对君子去追求名声，是就君子活着时而言的；在孔子看来，作为一个君子，活着时可以没有名声，但死后一定要有名声：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

(chēng)焉。”(15.20)这是因为,君子若死后没有名声,便说明他对这个社会没有作什么贡献。

4. 一个人,若不能成为君子,便堕为小人。为了更好地说明君子的特点,《论语》中有大量君子与小人对举的句子,如在为人处世方面:“君子成人之美,不成人之恶。小人反是”(12.16),“君子求诸己,小人求诸人”(15.21);在价值追求方面: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(4.16),“君子上达,小人下达”(14.23);在心理境界方面: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”(7.37),“君子泰而不骄,小人骄而不泰”(13.26);其他还有“君子周而不比,小人比而不周”(2.14),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”(13.23),等等。通过这些对比性的论述,便能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所在,从而认识到君子是多么的可贵,小人是多么的可鄙。

第三是治国思想。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,孔子曾在鲁国任中都宰、大司寇兼代理宰相,而且在任职期间,取得了极好的政绩,因此,孔子对自己的从政能力十分自信,说:“苟有用我

者,期(jī)月而已可也,三年有成。”(13.10)在《论语》中,记录了不少君主、官员、弟子向孔子问政的内容,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治国思想,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:

1. “为政以德”的德治思想。在《为政篇》中,孔子明确指出: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共(gǒng)之。”(2.1)至于为什么要“为政以德”?孔子解释说:“道(dào)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(2.3)意即只有用道德的手段来治国,才能既把国家治理好,又能提高百姓的道德水平;而用政令或刑罚来治国,则无法培养百姓的道德心。而人人道德高尚是孔子追求的理想社会的重要标志,所以必须“为政以德”。

2. 统治者以身作则的思想。“为政以德”作为治国的总原则,如何落实到具体的治国实践中呢?孔子提出的方案是统治者首先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,然后以此影响民众,则民众必会如影随形,自动归化,一个充满和谐、秩序井然的理想社会便可随之建立:“季康子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:‘政者,正也。子

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（12.17）“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，必偃（yǎn）。”（12.19）“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则四方之民襁（qiǎng）负其子而至矣”。（13.4）孔子认为，如果让自己来治理国家，“三年有成”，即三年就可取得成就，其信心便来源于上述理论。

3. 正名思想。正名即辨正名称、名分，使名实相符。正名思想出自《子路篇》：“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（zhōng）；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”（13.3）至于正名的具体内容，最有代表性的便是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（12.11），即社会上不同身份的人，都要按照其身份的规定去行动，具体说来，便是君主要有君主的样子，臣子要有臣子的样子，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，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。推而广之，便是领导要有领导的样子，教师要有教师的样子，警察要有警察的样子……如果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明白自己的本分，并严格按此本分的要求

去做，则整个社会当然就会和谐有序、太平安宁。

除了上述内容，孔子关于如何治国还有丰富的论述，如政府必须取得民众的信任：“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”（12.7）；从政者不能只看眼前利益：“无欲速，无见小利。欲速，则不达；见小利，则大事不成”（13.17）；反对财富分配不均：“丘也闻有国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”（16.1）；等等。这些思想，即使在今天，也仍有重要的价值。

第四是孔子的教育思想。杨伯峻在《论语译注》中说：“孔子以前，学在官府。……私人设立学校，开门招生，学费又非常低廉，只是十条肉干（7.7），自古以至春秋，恐怕孔子是第一人。”充分肯定了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说：“孔子以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教，弟子盖三千焉，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。”可见孔子在教育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十分卓著的。在《论语》中，记述了不少孔子关于教育的思想，概括起来，主要有以下四点：

1. 诲人不倦的教育态度。作为一个教师,首先就必须热爱自己的教育工作,为教育学生而不懈努力。在这个方面,孔子无疑堪称表率。如孔子经常以“诲人不倦”要求自己:“默而识(zhì)之,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,何有于我哉?”(7.2)“若圣与仁,则吾岂敢?抑为之不厌,诲人不倦,则可谓云尔已矣。”(7.34)在具体实施教育时,孔子也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,对学生毫无隐瞒:“二三子以我为隐乎?吾无隐乎尔。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,是丘也。”(7.24)因此,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对自己的老师有很高的评价:“夫子循循然善诱人,博我以文,约我以礼,欲罢不能”。(9.11)

2. 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。“因材施教”指根据受教育者的不同情况,采用相应的内容和方法施行教育,语本《论语·为政篇》“子游问孝”(2.7)、“子夏问孝”(2.8)朱熹《论语集注》引程颐曰:“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,故不同也。”在《为政篇》中,子游向孔子询问孝,孔子回答他:对父母要有恭敬之心;子夏向孔子询问孝,孔子回答

他:要始终在父母面前保持和悦的脸色。这是根据子游和子夏的不同性格特点、知识水平和所面临的情况,采取有针对性的回答。在《论语》中有大量与此类似的例子。如颜渊、子贡、樊迟等都向孔子询问过仁,孔子的回答就各不相同。在《先进篇》中,子路问孔子,是不是听到一种道理就马上付诸行动,孔子说不是;冉有就同一问题问孔子,孔子却说是。对此,孔子的解释是:“求也退,故进之;由也兼人,故退之。”(11.22)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,与中医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一样,极具中国特色,与西方式的教育、医疗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它注重的不是模式化、标准化,而是人性化、个体化,它要求施教者和施治者必须有极高的修养水平和责任心,这无疑是人类未来教育和医疗发展的重要方向,值得当今的教育工作者高度重视。

3. 有教无类的博爱情怀。“有教无类”出自《卫灵公篇》,意即对不同类别的人都施以教育。孔子曾说:“自行束脩(xiū)以上,吾未尝无诲焉。”(7.7)即从给我送来十条干肉作为礼物的起,我从来没有不予教诲的。在孔子的众多弟

子中,有贵族,有手工业者,也有农民;有冉有、子贡等富者,也有颜渊、原思等贫者;有聪明者,也有愚钝者。对被教育者不分贫富贵贱、聪明愚钝,只要有志于学习,便一律加以教诲,体现的正是孔子的博爱情怀,也是孔子仁学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落实。

4. 不愤不启的教育方法。“不愤不启”指不到学生苦思而不得其解时,就不开导他,出自《述而篇》:“不愤不启,不悱(fěi)不发。举一隅(yú)不以三隅反,则不复也。”(7.8)在孔子看来,真正有效的教育应该是启发而不是灌输。所谓启发,即先让学生就某个问题展开思考,当他百思不得其解,或隐约已得其解却又不知该如何表达时,老师才加以引导和点拨,从而让学生恍然大悟,茅塞顿开。这样获得的知识,必然记忆深刻,且能触类旁通,大大提高学习效率。孔子门下弟子众多,人才济济,这与其拥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有直接的关系。

在《论语》中,还有丰富的关于孝的思想,如“弟子入则孝,出则弟(tì)”(1.6),“父母在,不远游,游必有方”

(4.19),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,可谓孝矣”(4.20),“生,事之以礼;死,葬之以礼,祭之以礼”(2.5),等等。此外,关于如何处世、如何交友、如何进行学习、如何看待天命等,《论语》中都有深入、系统而又充满真知灼见的论述,限于篇幅,在此就不展开介绍了。

由上可知,《论语》中的思想确实是博大精深、严密系统、堂皇正大而又非常切于实用的,它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,是值得我们引以为傲的文化创造和精神财富。当然,我们说《论语》中的思想博大精深,并不意味着《论语》这本书完美无缺,所述均是真理。作为一部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作品,也会有其时代的局限性,有其明显的不足。总起来看,这些局限和不足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:

一是“为政以德”作为一种根本性的治国思想,操作起来有很大的难度。前面已经讲过,“为政以德”在具体落实时,首先需要统治者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,并以此去影响民众。然而,道德修养的关键是“克己复礼”,即克制自己的欲望,一切按照礼的要求去行动。那么,作

为拥有最高权力、掌握巨大财富的统治者，你怎么能确保他会去克制自己的私欲呢？万一统治者不愿意克制自己的私欲，则儒家的所有政治设计岂不就成了空中楼阁？孔子周游列国，却没有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愿意采纳孔子的主张，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。另外，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的一些论述也会让人感到确实有些“迂”。如在《颜渊篇》中，记述在鲁国执政的季康子问孔子如何对付盗贼太多的状况，孔子回答说：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”（12.18）意即如果你自己不贪财，即使奖赏偷盗，也不会有人去干。又记述季康子问孔子，如果杀掉那些坏人，来亲近有德之人，怎么样？孔子回答说：“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”（12.19）这样的回答，从道理上来说，固然没有错，但无疑存在立论过高、不切实用的问题。而且，验诸中国古代的历史，真正愿意克制自己欲望的统治者可谓少而又少。就连率先“独尊儒术”的汉武帝，也被手下的大臣汲黯（jǐ'àn）批评为“内多欲而外施仁义”；唐太宗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注重自身修养的帝王之一，他提倡德治，虚

心纳谏，开创了“贞观之治”的盛世局面，然而到了晚年，却自恃功高，刚愎自用，追求奢华，与昏君无异。因此，孔子“为政以德”的德治思想更多地只能代表一种治国理想，要想在现实政治中具体操作，难度较大。

二是重道德而轻法律。一部《论语》，核心思想是如何培养仁德，如何成为君子。而在孔子看来，一个人要想成为君子，成为仁人，就必须通过道德的手段，即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（2.3）；如果依靠法律、政令等手段，则只能培养出毫无羞耻感的小人，即所谓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礼，民免而无耻”（同上）。孔子的这一观点，在逻辑上是存在漏洞的，因为通过非道德手段照样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（具体论述可参阅2.3的“导读”）。在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后，孔子的这一思想直接指导古代的政治实践，造成中国古代社会法制松弛、有法不依、执法不严、伪君子盛行的明显弊病。

三是没有明确儒家思想的适用条件。马克思主义认为，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，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，都有其发

挥作用的前提和范围,脱离了这一前提和范围,真理便有可能变成谬误。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,儒家思想提倡秩序、提倡和谐,注重道德修养,这在一个大一统的社会里,在天下一家的情况下,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治国思想。然而,如果在列国竞争、弱肉强食的环境下,依然把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而不加变通,便有可能造成国家的灭亡。在中国历史上,汉朝和唐朝依靠儒家思想治国,使中国社会臻(zhēn)于全盛的局面,就是因为当时天下一统,中国无竞争对手。相反,北宋的灭亡、南宋的灭亡,乃至后来清朝的积贫积弱、受尽列国欺凌,就都与中国社会面临强敌欺凌而仍以儒家思想立国有直接的关系。当然,在这个问题上,我们不能去苛求《论语》,因为我们不能要求孔子在创立儒家学说时,考虑得如此长远和细致。

除了上述三点,《论语》中关于“君君,臣臣”(12.11)的思想,“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”(8.9)的思想,以及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”(17.25)的思想,等等,在今天看来,它们都是存在问题的。但是,它们或反映了孔子生活

的那个时代的特点,或是孔子针对某种特殊情况所作的表述,需要我们作出具体的分析和理解。

以上指出了《论语》中存在的一些不足,颇有些吹毛求疵(cǐ)的意味,丝毫不损《论语》这部伟大的经典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价值和地位。正是因为《论语》蕴含的巨大思想价值,同时也因为孔子巨大的人格魅力,古今中外,对《论语》进行注解的著作不计其数。据初步统计,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就达数千种之多。《论语》也是当今出版界的热门书籍,各种形式的《论语》注译、解读作品层出不穷,它们对于理解《论语》、普及《论语》中的重要思想产生了积极的作用。然而,仔细分析这些作品,却也发现它们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:

一是注释不够详细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:1. 在中国古代经典中,《论语》的文字虽算不上晦涩古奥,但它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作品,其中许多字词的含义都与现代汉语不同,若不对它们详细注解,现代人是根本看不懂的。然而,目前流行的《论语》注释作品,基本都是简注,因此,实事求是地说,要想依

靠目前已经出版的《论语》注译作品去完全看懂《论语》的意思,是有很大难度的。2.《论语》中有不少字词如道、仁、文、君子、小人等在不同的篇章中反复出现,而且它们在不同的场合使用时,意思往往并不相同。目前已见的各种注译作品,都是对首次出现的疑难字词作注,当它们在文中再次出现时便不再作注。因此,除非读者有过目不忘之本领,或有极好之耐性从头至尾细细阅读全书并不时作笔记,否则是很难真正看懂《论语》的。

二是只有注译,没有导读。对《论语》原文加注并作白话翻译,可以让读者知道《论语》说了什么,但是,光知道《论语》说了什么,并不代表你看懂了《论语》。如“君子不器”(2.12)一句,其中的“器”指器皿,整句话的译文是君子不是器皿。凭借这一注译,读者能知道这句话的确切意思吗?如《雍也篇》中,记载孔子说:“觚(gū)不觚,觚哉!觚哉!”(6.25)意即觚不像觚的样子,这还是觚吗?那么孔子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?仅凭注译也是无法得知的。另外,《论语》中有不少篇章,或迄今无法

理解,或学者们众解纷纭,难趋一致。如杨伯峻在《论语译注》中就曾说过:“《论语》的词句,几乎每一章节都有两三种以至十多种不同的讲解。”而这也是仅凭注译无法解释清楚的。因此,种种情况表明,要想让读者能真正读懂《论语》,就必须有系统的导读文字。

正是为了弥补当前《论语》注译作品中存在的上述两个明显缺陷,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揭示《论语》的内涵和现代价值,我们撰写了这部《国学经典规范读本·论语》。概括地说,本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:

一、本书的原文以中华书局1954年版的《诸子集成》中所收的《论语正义》为底本,同时参阅了历代影响较大的《论语》注本及当今一些较具代表性的《论语》出版物。

二、注释简洁、准确、客观、全面。本书作注的原则是逢疑难必注,不回避问题,对于迄今仍存在分歧和争议的地方,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,或明确表示存疑,或同时列举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,以提示读者此处内容并无确解。本书在作注时,以章为单位,对每一个有

疑难的字词进行注释。不过,为了避免烦琐与重复,对于同一个有疑难的字词,若在相邻的章中都出现,则只在首次出现时作注;若隔一章或若干章后再出现,则分别作注。同时,注释文字一律采用《汉语大词典》《辞海》《辞源》《古代汉语词典》等权威工具书中的解释,以避免误导读者。

三、在白话翻译部分,尽量采用直译的做法,不作引申和发挥,并力求使译文精致、流畅。

四、采用了“导读+图说”的经典解读方式。在“导读”部分,除了对原文的内容作深入的说明,揭示其实质和价值意义,还尽量根据相关的历史背景来进行剖析,以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 and 接受。“图说”则主要根据“导读”中所涉

及的内容,选择历史上的相关绘画来进行配图。本书在配图时,严格采取一一对应的原则:图是对“导读”文字的形象化描绘,“导读”文字则仿佛是对图的说明。从而避免了以往诸多国学经典图文本配图随意的弊病。

总之,严谨、细致、力求完美,这是我们撰作《国学经典规范读本·论语》的指导思想;规范、权威、美观大方,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衷心希望广大读者能在赏心悦目的阅读中,轻松把握《论语》的思想和精髓。

冯国超

2017年7月于北京